

总之，人口的地理移动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领域却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除了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希望有更多学者投身到美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亚裔美国人的婚姻融合研究

王玉君^{*}

跨种族通婚可以看成是社会距离和社会融合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被作为衡量社会距离和社会融合的关键指标，当然很多时候也可以看成是原因，很多美国学者在做相关的研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过，种族之间的吸引和排斥，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测量群体间是否存在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来加以判断。在所有具备种族意识的群体中，是否存在这种跨种族的婚姻或者通婚，是种族间吸引或者隔离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是基于韦伯的创见去理解社会中的种族关系，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族群之间稳定的婚姻关系来研究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我和你是不是平等，个人之间是不是平等，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我愿不愿意把你当作我的朋友、有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来观察。

有数据表明，自 1967 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反族裔通婚法律之后，美国跨族裔通婚率在增加。1980 年全美异族通婚率是 1.81%，2002 年是 2.89%，2015 年跨种族婚姻，比如说笔者所考察的亚裔跨种族通婚率是 29%。以前很多研究是基于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但是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族裔的人口分布在发生变化，而且人口代际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出现了二代移民，或者本地出生的亚裔人。通婚的模式随地理区域不同和种族组合的不同而大有差别。有时候异族通婚中的族裔地理分布会被误解为社会距离，所以在有些学者的呼吁之下，研究异族通婚既要考虑人口的地理分布因素，也要控制族裔的代

^{*} 王玉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际因素。

笔者首先对异族通婚文献进行简单的回顾。有三个理论解释异族通婚，第一个是我们熟知的融合理论，异族通婚实际上是种族融合的要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 戈登（Milton M. Gordon）提出了七阶段模型，认为融合首先是从文化行为方式开始的，慢慢地会发生大规模结构融合、婚姻融合，进而会出现身份融合、偏见消失、歧视行为消失。跨种族婚姻中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多与主流社会相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但戈登的理论将融合视作一个单向且一致的过程，即所有移民最终都将接受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产阶级的核心文化，其表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和必然性使其受到很多批评。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和维克多·倪（Victor Nee）将该理论扩展以解释更多元的移民群体，认为融合是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种族和民族内部存在差别。而种族或民族的社会边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可以随着代际更迭发生社会边界的“模糊”“移位”或“跨越”的，因此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拥有多元背景的移民融合会“重建”美国的主流社会。

第二个理论是结构理论视角。彼得·M. 布劳（Peter M. Blau）、奥蒂斯·D. 邓肯（Otis D. Duncan）就提出，即使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结婚偏好，没有将外族人看作与你同等的人，但是因为机会的原则，你可能也会和外族人通婚。这一理论关注人口结构构成如何影响婚姻选择，也就是潜在结婚对象的可得性是如何限制或增加个体接触机会进而影响最终婚姻选择的。结构变量主要关注人口的规模和构成，以及种族或失衡的性别比等对婚姻机会的形塑。布劳认为，通婚不仅受到群体特定属性（如群体规模和性别比）的影响，也受到群体间社会与空间距离（如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结构理论关心群际（intergroup）关系的机会问题，受少数群体的相对规模、族内潜在伴侣的可得性、族内多样性以及不同群体间社会和空间距离的制约。

第三个理论是交换理论，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 莫顿（Robert K. Merton）、乔治·C. 霍曼斯（George C. Homans）分别提出来的理论模式，认为对非裔美国男性相比于女性更有可能与白人结婚的解释是，高学历非裔男性倾向于用后天自致的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来换取白人女性先赋的社会地位，并将该模式称为“白人女性的下嫁”。有很多数据及早期的研究证实了莫顿等人的交换理论，比如对白人和黑人婚姻的研究，或者拉美裔和美国白人婚姻的研究。但也

有学者对该理论解释其他族裔通婚实践的有效性进行质疑,比如有学者发现该交换模式无法解释亚裔美国人的婚姻选择。

后来有学者试图对三个理论视角进行整合,认为机会(即婚姻市场条件)和偏好(即群体间的社会壁垒和社会距离)模型可以解释异族通婚。基于这个思想,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当地的婚姻市场去考察当地的机会和偏好,会不会有助于把传统通婚研究中的三个视角整合起来?我们可以考察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如当地婚姻市场中群体的相对规模、性别比、社会空间距离、教育因素、族裔通婚比例等,而偏好是多维并且可交换的。我们可以综合以上的理论视角,并运用多层模型控制当地婚姻市场条件,从而在分析通婚模式时能够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整合起来。笔者选择了美国 2008 年社区调查数据(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1% 的样本,有 280 万条个人记录。这是截面数据,可能会出现结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调查时点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一样的情形,同时很多研究发现,族裔通婚的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再婚会有选择性偏差,所以我们借鉴了以往的研究,将数据限制在婚龄小于 5 年的初婚,且年龄介于 15 岁和 55 岁之间。最终的样本中出现的亚裔男性是 3099 个,亚裔女性也是接近这个数字。

我们使用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因为收入在婚前、婚后有很大的变化,但教育程度的变化非常少。因变量是“异族通婚”,为二分变量,编码为 1 时指亚裔美国人与非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婚姻,0 则指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婚姻。我们选择了多层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测量亚裔美国人与非亚裔美国人通婚的概率,并对亚裔男性和亚裔女性分别进行模型估计。

自变量包括个体层次的变量和都市圈层级的宏观结构变量。本研究样本仅限于在美国本土出生或初婚前来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不包括在国外结婚后移居美国的移民。异族通婚率通常随着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而提升。在这里,我们使用“本土出生”来体现社会融合的观点,并创建了三个虚拟变量:美国本土出生(第二代移民及以上)、14 岁前移民到美国(完全或部分融入美国社会,1.5 代移民)和 14 岁之后且初婚前移居到美国(第一代移民,在原籍国家接受社会化)。出生在美国和在美国长大的亚裔预计更有可能选择异族通婚。

我们使用“英文能力”这个和教育程度有很大相关性的变量,来测量受访者在家庭中讲英语的能力,并创建“不讲英文/英文说得不好”“英文讲得好”和“只说英文”三个虚拟变量。我们选择“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是基于机遇和偏

好的考虑，比如大学提供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场所，同时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因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相似也更容易产生同类婚。已有研究发现异族通婚往往在高学历人群中更为常见。

都市圈层级的宏观变量，将综合大都会城市统计区和城市人口的大都会城市统计区界定当地婚姻市场。我们使用了亚裔群体的相对人口规模、种族异质性指数以及亚裔群体中的性别比等指标。测量群体规模的指标为 2008 年都市圈层级亚裔人口占总人口（15—55 岁）的比例，可以测量不同族裔群体间互动的机会。相对规模较小的群体内，个体间接触机会很少，因而与群体之外的人群接触概率较高。因此，群体相对规模对亚裔—非亚裔间婚姻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保持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亚裔群体中选择非亚裔伴侣的可能性比较低。

此外还有性别比的测量。本研究将都市圈层级亚裔女性与亚裔男性（两组群体年龄均在 15 岁至 55 岁）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作为性别比，范围是 $(-\infty, \infty)$ 。若为 0，表示性别比均衡；若大于 0，表示亚裔男性数量少于女性；若小于 0，表示亚裔男性比女性数量多，因而亚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异族结婚对象。以上对性别比的计算对亚裔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效应。对亚裔男性而言，性别比与异族通婚呈正相关；对亚裔女性来说，性别比例与异族通婚呈负相关。

第三个因素是种族异质性的指数，就是多元化的指数。从结构理论来说，在族裔群体多元且各群体人口分布比较均衡的城市，不同族裔个体间接触的机会比较高，所以族际通婚率会更高。我们沿用了前人的计算方式，计算了异质性指数（五个群体，未经标准化处理的种族异质性指数的理论范围是 0 到 0.8）。当异质性指数为 0，意味着从同一城市中任意抽取二人，他们会来自同一族群（无种族多样性）；指数为 0.8 时，意味着任意抽取二人，他们会来自不同种族，即种族多元性较强。

宏观理论结果也认为，在种族异质性比较高的市场中，亚裔和非亚裔通婚率比较高。数据显示亚裔初婚配偶族裔的情形中，亚裔男性 17% 左右是族外婚，亚裔女性有接近 33% 是族外婚。在最终的数据处理，由于都市圈里要考虑通婚市场，我们就排除了很多亚裔人数少的城市。结论的确显示，移民信息在发生变化，二代移民更容易族外婚。英语水平越高，确实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族外婚，但是教育程度失去了效应，这个很奇怪，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了教育程度的影响，我

们就把英语变量去除之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又显著了,教育程度和英语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

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是,对亚裔男性模型来说,性别比应该是正向影响,如果在自己族内找不到匹配的女性结婚的话,应该更多转向族外。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婚姻市场中,我们的理论推测失效了呢?后来我们进一步做了分析,发现原来很多亚裔男性更多会选择回原国、回原籍地,找自己婚配的女士带到美国去。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大概有 28% 的人,他们的妻子在结婚当年,或者结婚之后才到美国,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考察了一下亚裔女性的因素,还是负的,这确实对她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是女性,出现了找不到相匹配的男性,因为女性多、男性少,她们是从美国当地婚姻市场找匹配的对象,更多的是族外婚,但是对男性来说有其他的策略,比如从国内搬运。

如果我们用数据分析,可以看到通婚的比例在提升,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不同的机制。一个是人口本身的机制,因为人口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造成通婚率的变化。另一个可能是人口通婚偏好的变化,即社会融合的影响。我们需要去分析具体产生作用的机制。

跨国“圣战”分子与中东政治变迁

田文林*

中东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世界对中东地区的关注,首先不是它的经济发展,而是安全形势。在中东最突出的跨国人口流动不是难民问题或移民问题,而是跨国“圣战”分子问题。前几年“伊斯兰国”最活跃的时期,来自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纷至沓来。仅仅在叙利亚,就有来自世界 80 多个国家的 3 万多名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欧发达国家。在此之前,1979 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同样是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赶赴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的“圣

*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